



# “两翼齐飞”助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

■ 褚建勋 王 喆

中华文明始终蕴含着理性求知与人文关怀的双重基因。在AI时代，我们应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使传统文化与科学精神在新时代交相辉映。

场科学精神的重要途径，应与理论宣传协同发力，共同筑牢全社会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精神凝聚力植根文化传统，也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滋养。从《论语》的仁爱思想到“格物致知”的科学探索，从《天工开物》的技术总结到当代科技创新的伟大实践，中华文明始终蕴含着理性求知与人文关怀的双重基因。在AI时代，我们应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使传统文化与科学精神在新时代交相辉映。

价值感召力需要与时俱进的传播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既要依靠传统宣传教育，也要借助AI、大数据等技术实现精准传播、情景化融入。通过开发优质科普资源、建设智慧教育平台，让价值观传播更具针对性、更有温度，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和价值认同。

国际影响力依托于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在AI打破时空界限的今天，我们应充分发挥多模态大模型、智能翻译、虚拟现实等技术优势，创新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既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分享中国科技的创新成就，向世界展现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人文与科技并重的真实中国。

## 推动 AI 与文化深度融合,打造科普创新体系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文化发展生态。从智能推荐到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从虚拟现实到元宇宙体验，技术革新为文化生产和传播开辟了新天地，科普及工作也应实现从“知识传递”到“文化塑造”的转型升级，构建适应智能时代的科普创新体系。

文化生产环节，应促进AI与科普创作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不仅是工具，更

是创意伙伴。它可以帮助科研人员将复杂原理转化为通俗表达，辅助创作者开发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文化产品。但是，技术再先进，也无法替代人类的创造力和价值判断。优质的科普内容终究源于科学家与创作者的智慧碰撞。

文化传播层面，需构建智能精准的科普传播网络。通过算法优化实现科普内容的精准推送，借助智能翻译推动中国科普成果走向世界,利用沉浸式技术打造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同时,要注重防范算法偏见,确保科学知识传播的准确性和多样性,避免形成“信息茧房”。

文化消费领域，要丰富优质科普资源供给。大力发展数字博物馆、云端科技馆、智慧图书馆等新型文化设施，推动高端科研资源科普化、数字化、可视化。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科学文化建设不仅关乎国民素质提升，也将为文化产业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 坚持“两个结合”，筑牢科技文化自信根基

“两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遵循。在AI时代，这一重大原则同样指引着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的方向。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要求我们运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解决AI时代文化建设和科学普及面临的新问题。要密切关注技术发展对文化治理、科技伦理、公众理解科学等方面的影响，建立健全适应智能时代的科普工作体系和政策环境。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要求我们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科学基因和理性精神。“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格物致知”的探索精神、“知行合一”的实践理念，都与现代科学精神高度契合。通过AI技

术，我们可以让这些古老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光彩，开发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科普产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面向全球文明倡议,提升科技文化国际影响力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科技文化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华文化历来崇尚“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在AI连接全球的今天，我们更应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科技文化的交流互鉴。

要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体系改革。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善于运用AI技术，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在人工智能伦理、数字鸿沟治理、科技普惠等全球性议题上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通过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发起国际科技倡议、承办国际会议等方式，增强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文化品牌。创新科技文化国际传播方式，进一步挖掘已有国际传播平台的科普功能，强化科技文化交流功能。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文化品牌,支持我国科技期刊、科普产品、科技影视作品“走出去”，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文化企业。通过联合科研、学术交流、科普合作等多种形式，向世界展示中国科技的创新成就和科学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化是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是时代进步的关键引擎。在AI技术重塑世界格局的今天，以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发展具有强大“四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充分发挥科技传播与科学普及的独特价值。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两翼理论”重要理念，推动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比翼齐飞，让科学文化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让中华文明在智能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褚建勋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融媒体研究所所长；王喆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系2024级博士生）

实挑战；青年创业团队在数据获取、算力支撑与跨境合规方面仍存在一定盲区，“想用数却用不起”的难题亟待解决。要让企业“造得好车、跑得更快”，必须通过制度与政策的双重驱动。其首要任务是加快建立市场化的收益分配机制，让各方合理分享数据要素的增值收益。需持续优化并扩大中小企业服务券覆盖面，大幅降低创新创业的初始门槛。尤其要重视激发青年群体的创新能量，鼓励他们深度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和数据生态建设；在“数据要素×”赛事中设立青年和中小企业专属赛道，支持其孵化新产品、新模式；建设青年数据创新社区与开放实验室，助力其在AI训练、安全计算、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探索新场景，使之真正成为激活数据新动能、驱动市场未来增长的“新引擎”。

## 迈向协同共治的数字中国新图景

纵深推进数据要素统一大市场建设，不仅是一项制度工程，更是一个激活社会创新潜能、塑造数字文明的时代课题。随着协同治理体系日益完善，“有为政府”将更精准，“有效市场”将更高效，“有力企业”将更富活力，三者动态共生——政府提供制度供给，市场形成配置机制，企业与社会个体（尤其是青年）激发创新活力。

通过“制度轨道—市场流通—企业驱动—青年赋能”的协同体系，我国将在制度优势与创新动能的“双轮驱动”下，推动数据要素市场行稳致远。当数据得以顺畅流动，当创新被赋予人的温度，无数青年个体的小循环将汇入国家发展的宏大循环，这既是数据要素市场的未来图景，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最生动的数字注脚。

（作者王雅臻系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科协联合咨询商交通与可持续基础设施专业委员会创始委员；靳馥境系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

### 学者看法

新就业群体是伴随着平台经济、新业态发展而涌现的大量劳动者，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当前社会面上最活跃的群体之一，也是助力城市建设和基层治理的新兴力量。

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决定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明确统筹推进党的群众工作、社会工作和社会治理等任务，其中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指导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持续强调“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服务好新就业群体，已是各级社会工作部门义不容辞的核心职责和工作重点。

### 新兴力量不应被视为负担

新就业群体是伴随着平台经济、新业态发展而涌现的大量劳动者，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当前社会面上最活跃的群体之一，也是助力城市建设和基层治理的新兴力量。然而，一些地方仍习惯于把新就业群体的管理服务当作一种额外的行政负担，对新就业群体在城市运行保障和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认识不够，将他们更多地视作需要监管的对象，而非可以依靠和凝聚的力量。这种观念滞后不仅限制了服务举措的主动性，也影响了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生活、发挥其所长的空间。

### 城市“新市民”融入载体仍然缺乏

针对新就业群体具有来源多样、流动分散、作息不规律等特点，一些城市已开展有益尝试，如北京市推进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之城”，在街道层面设立“小哥驿站”“暖新驿站”等服务点，邀请快递员、外卖员担任社区“副楼长”“网格员”“平安志愿者”，让“小哥”们运用熟悉街巷、人熟地熟的优势参与治安巡防、困难帮扶等基层治理工作。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已有269万新就业群体到街道社区报到，成为基层治理中一支新生力量。但相较于全国8400万的新就业群体总量而言，上述融入城市的探索还在初步阶段，仍有一些局限。在不少地方，新就业群体仍缺乏常态化、制度化的融入载体：比如，像党群服务中心、社区驿站这样稳定的线下阵地，或者有效的线上联络平台和组织动员机制。这导致许多新就业群体虽然工作生活在城市，却难以真正“进社区”“进组织”，在遇到困难时缺乏支持网络，在参与社区事务时缺乏渠道。城市治理如果长期忽视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无疑会留下盲区甚至隐患。建立健全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的机制载体，已成为当前基层治理亟待补上的一课。

### 创新“枫桥经验”的时代契机

如何将分散流动的新就业群体更好地组织和凝聚起来，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大课题，也为地方社会工作部门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提供了契机。枫桥经验的精髓就在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解决群众自己的问题。这一传承千年的基层治理法宝，在今天应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赋予新内涵。当越来越多的新就业群体涌入城市社区，完全可以通过党建引领和社会工作专业手段，把他们团结、凝聚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要针对新就业群体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强人文关怀和权益保障，为他们融入所在社区和城市搭建平台，增强其归属感和安全感。各地实践也表明，当政府搭台、社区欢迎时，新就业群体就愿意走进社区“亮身份”“报到服务”。许多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利用工作之便，主动承担邻里守望、治安协查、环境监督等职责，在为居民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在维护着社区的和谐稳定。通过有效的组织动员，新就业群体正实现从“服务对象”向“治理力量”的转变。探索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共建共治，正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既把矛盾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又把新的社会群体吸纳为共建平安有序社区的同盟军。这既有利于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认同感、归属感，也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 转变理念积极作为

推进新就业群体治理与服务并非易事，地方社会工作部门需要直面其中的困难与挑战。首先，新就业群体就业方式灵活、人员流动性强，这给基层组织管理带来不小难度——常有基层反映存在“管理难、服务难、引领难”等问题——因此需要在工作机制和方法上大胆创新，通过信息化手段摸清这一群体底数，通过党建和群团组织实现精细化联系服务，突破传统的按行政区域、单位管理的局限。

其次，一些配套政策或需完善，不少新就业群体人员反映职业发展空间相对狭窄、社保接续较为困难、权益维护渠道不够通畅等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地方开展服务工作的压力。地方社会工作部门在推进相关工作时，需要联合人社、住建、工会等部门协同发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最后，新就业群体中党员数量占比还不够高，党组织覆盖难度不小。要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在机制和手段上创新：一方面，依托行业平台和大数据建立党员信息库，摸清党员分布，实现“找得出、管得住”；另一方面，探索“云上党支部”“流动党支部”“行业链党支部”等灵活设置方式，将分散党员重新组织起来。

新就业群体既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基层治理的新生力量。各地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正视自身在服务新就业群体上存在的短板，以更积极的姿态投入这项工作。唯有积极担当作为，才能把对新就业群体的“管理和服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让这支新兴力量更好地融入城市发展、谱写社会治理的新篇章。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数字生态社会价值研究所所长）



11月19日，江苏连云港，新就业群体制作冬季养生茶包。

■ 庄家炽

新就业群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力量

### 思想者观察

# 激活新动能，纵深推进数据要素统一大市场建设

■ 王雅臻 靳馥境

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已从“政策破冰期”进入“制度落地与市场协同的深水区”，必须通过深化“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力企业”的协同治理体系，打通制度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其中，尤其需要关注中小企业和青年创新创业群体——他们既是数据要素市场最具活力的新动能，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和创造者。

月开始施行，使跨境数据流动更加便利，为企业提供了“负面清单+白名单+标准合同”的便利化保障。

然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地方治理逻辑与全国统一大市场所要求的系统性、网络化运行之间，仍存在结构性张力，它直接外化为各地在数据分类分级、定价评估、交付合规等关键环节的标准不一与执行差异，形成了新型“数据壁垒”，严重阻碍了数据的跨区域互认与全国性高效流通。

面向“十五五”时期及更远的未来，应进一步统筹数据要素规则“底座”，推动基础标准统一，实现跨区域互认与“一网通办”；通过发布典型案例、裁量基准和“合规白皮书”，完善执法与司法衔接，稳定市场预期；在“准入—流通—使用—安全”全链条实施差异化治理，探索“低风险快速通道+高风险重点评估”的精准监管，为创新预留包容、审慎的空间。

## 有效市场：促竞争、活流通,以高效生态释放要素价值

市场机制是数据要素价值倍增的关键。工业制造、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等十二大领域的“数据要素×”行动持续深化，企业“供数—用数”链条日益完善，市场活力显著增强。截至2024年年底，北京、深圳等领先的数据交易所累计备案交易额突破百亿美元级，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潜力。

我国数据要素市场仍处于“多点开花”的探索期，要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需着力提升协同效率。应依托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推动“点状试验”向“网状复制”转变，形成可评估、可推广的全国机制；完善统一目录、指标和合同模板，建设质量评价与价格指数体系，增强交易的公信力与透明度。

尤其应鼓励地方政府、交易平台与青年创新创业协同共建，探索“政府+平台+青创团队”的共治模式，让政策创新更接地气；可以支持青年团队作为“数据创新合伙人”参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与场景开发，推动“高质量数据—高频交易—规模化应用”的良性循环。

## 有力企业：“造好车、跑得快”，以制度创新激活市场主体

企业是数据要素市场的主力军。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数据企业数量已超过40万家。其中，大量中小企业和青年创业者活跃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智能制造、数字文旅等前沿领域，这些“数字原住民”对数据价值的敏感度高、应用创新快，为数据价值转化注入了强劲动能。各地推出的算力券、语料券、训力券、数据要素券等普惠性、创新性政策工具，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持。然而，中小企业仍普遍面临权责界限模糊、收益分配不清、合规成本偏高等现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创新的核心引擎，数据要素的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尤为关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4年）》显示：2024年我国数据生产量达41.06泽字节（ZB），较“十三五”末实现翻倍增长，数据产业规模达5.86万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0%左右。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市场基础制度框架初步确立——从2022年年底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奠定顶层设计，到国家数据局统筹推进，再到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数据交易所纷纷探索实践，共同推动了数据要素市场的蓬勃发展。

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已从“政策破冰期”进入“制度落地与市场协同的深水区”，必须通过深化“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力企业”的协同治理体系，打通制度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其中，尤其需要关注中小企业和青年创新创业群体——他们既是数据要素市场最具活力的新动能，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和创造者。

**有为政府：建“轨道”、立“交规”，以统一规则保障公平预期**

近年来，国家层面的制度供给持续强化。“数据二十条”确立了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的顶层设计，构建起涵盖确权、流通、分配、安全的制度总纲。国家数据局全面落实《“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部署建设多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形成了“政策先行—机制探索—成果推广”的良性循环。《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2024年3